



“发现记者立即上报”，不如“发现自身问题立即改正”。对各地而言，也只有将“解决提出问题者”的思路拽回到“解决问题”上来，方为正道。

——余寒。5月12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下辖各住宿场所，被当地派出所要求“盯梢”记者。就在两天前，有媒体刊发报道了《广东一镇政府异地投诉代理村民维权的律师事务所，村民申请公开花销》，提到陈村镇赤花村村民因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纠纷，聘请天津律师维权，而当地政府派人到天津律师投诉律所所在律所违法，最后律所被判判定未违规。

只有具体的人，具体的道歉，具体的忏悔以及具体的惩罚、原谅与宽恕，才更有力量。

——张丰。近日，日本“国民作家”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曾经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



没有底线的“包袱”并不好笑

□李西铨

5月13日晚，《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张云雷事件发酵 郭德纲早年调侃英烈视频被翻出》一文，在沸沸扬扬的张云雷事件中，师傅郭德纲的不当表演也被挖出来了。细看下来，这些视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当这些惹争议的“包袱”被演员抖出来时，现场观众均哄笑不断，似乎无人注意这些表演“有问题”。

慰安、地震、革命烈士，这些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必须得到严肃对待的“痛点”被当成“抖包袱”的素材，此种行为对国人的公共情感必然会造成严重伤害。如果观众们听之任之，配合演员追求无底线的娱乐万岁，那么做人基本的共情能力与道德修养岂不是要被抛之于九霄云外，泯然于笑声之中了？

作为一门民间曲艺艺术，相声的需求和市场有所扩大是一件好事，大众化、通俗化的革新也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革新不该表现为自降底线，重回低俗。对话艺术，讲求的是相声演员与观众通过语言进行精神交流，观众之所以会开怀大笑，是因为相声诙谐叙事、调侃人生、讽刺现实的幽默态度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如今演员利用观众情绪，用低级趣味的“污言秽语”去和观众沟通的做法，与艺术二字实在不沾边。

其实相声的市场化没有什么问题，迎合大众，造一些接地气的梗还能更好地保护这门艺术。但完全屈从于市场与利益，转而放弃曲艺艺术内核，制造无底线低级笑料的做法就是在背离初衷了。

作为观众，保持理智，批判地对待任何一项艺术是现代人的应有审美素养。要知道，曲艺艺术的内核不是简单的“好笑”两个字就可以涵盖的，更何况，那些没有底线的“包袱”一点都不好笑。

习惯“非一次性”生活

□东原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拎包出门”，而包里连洗漱用具都不带，因为宾馆早已经提供得好好的。可是，未来可能会遇到尴尬。从今年7月1日起，上海市旅游住宿业将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同时，根据上海市文旅局发布的实施意见，违者将依法处罚，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据《人民日报》)

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有酒店44万家，接待旅客48亿人次，其中，70%以上的香皂在仅使用过一次之后就会被丢弃。按重量计算，每家酒店每天约有5斤一次性香皂被丢弃，全国一年丢弃的香皂就超过40万吨，按照每吨香皂两万元来算，就是80亿的花销。这是直接成本，还有垃圾处理成本。仅仅香皂就如此，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又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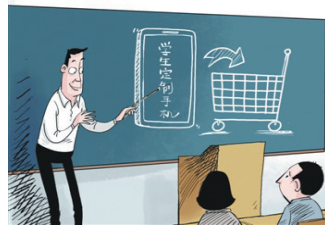
控制一次性用品，或许会给出行带来不便，降低用户体验，但看到，这么做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还可以保护环境，缓解二次污染的问题。现在绿色生活最时尚，也正是因为如此，携程旅行网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八成消费者支持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

因为有着“主动”这两个字，一次性日用品的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意义？拿“限塑令”来说，很多人只看到了那些花钱买的塑料袋，而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增加了这一环节，原来是伸手就要一个塑料袋，而现在悄悄缩了一下手，很多人的习惯悄悄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塑料袋的使用肯定会远远超过目前的规模。这里，不是说“限塑令”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改善和提升，而是说不能因其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就彻底否定其价值。

因为考虑到了人们长期以来

形成的习惯，担心一下子“断供”会带来旅行的不便，这才提出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这个规定的作用，不会一下子就带来180度的转变，但只要这个规定存在，就会慢慢侵入人们的内心，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正如很多西方国家酒店宾馆不提供一次性日用品，当地消费者还不是一样习惯，就连中国游客也慢慢接受，当成一个旅行常识了。可以预计，这么做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随着共识的日益增进，总有一天，就没有“主动”两个字，而是直接规定“不提供一次性日用品”了。

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日益重视，随着绿色生活新时尚的深入人心，很多曾经习以为常的现象都会发生改变。正如一次性用品问题，存在的空间必然会越来越逼仄，对我们来说，也要慢慢习惯没有一次性用品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也是对公众的一次提醒。



图/勾犸

校园与商业应有隔离带

□木须虫

日前有网友爆料，广西柳州市高级中学为家长推销一款某品牌定制机型。该手机自带“管理平台”，可实现对学生的四大管控，包括时间管理、网址管理、学校资源共享及记录违规行为。对此，校方表示，此举源于家长诉求，家长要求学生使用手机加强管控。学校未与厂家达成协议，不参与任何收费，也不强制购买。

5月13日，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已经启动调查。手机品牌方也随即回应，对此毫不知情，管控平台是第三方软件公司应校方要求开发。

(据《新京报》)

商业进校园，社会诟病已久，一直都被视为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但屡禁不止。针对商业进校园，还需要“双向治理”，同查同惩，设置不良商业竞争入侵校园的隔离带。

一方面，进一步厘清校园与商业广告、商业活动的关联责任，从纪律上划出明确的禁区，坚持“零容忍”；另一方面，针对商业进校园，从法律上廓清模糊地带，对营销的方式与行为予以准确定性，划出清晰的红线，遏制针对校园非法定向营销的冲动。



【本期话题】

只建一个微信群

近日，广东珠海香洲区印发相关通知，要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专项工作微信群在结束工作后应及时解散。网友纷纷点赞，“优秀”“请去全国推广”“艾特老板一万次”……有网友则表示：还有钉钉和QQ，电话也会变多……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小辣椒：支持，跟工作有关的微信群多达几十个，感觉自己的生活都被工作绑架了。

◎柯桥网友：一旦出现只允许有一个群的存在，无论是工作还是效率都会大打折扣，而且临时通知在下班后很常见。该措施太过于理想化，和现实工作情况严重脱节，是属于不顾实际情况的“一刀切”。

【下期话题】

劳动意识缺乏

小学生不会剥煮熟的鸡蛋、不会拿扫帚扫地，大学生让家长定期到校洗衣服、请家政公司来宿舍搞卫生……在部分学生和家长们眼里，劳动无足轻重。记者走访多所大中小学了解到，不少学校没有开设劳动课程，一些学校虽然开设了劳动课程，但常常纸上谈兵、形同虚设。对此，你怎么看？

“低级错误”还是“高级操作”不能自说自话

□杨三喜

考研成绩公示完成，10名进入“待录取状态”、坐等“被录取”消息的考生，等到的却是学校方面的“不好意思”和“成绩错了”……近日，湖北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成绩两次公示出现大面积修改，分值变化在0.5分至43分不等。这一变化，引发部分考生及家长的强烈不满。媒体报道这一现象之后，湖北经济学院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工作人员犯下的低级错误，但更改之后的成绩是真实的。(据光明网)

这么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岂能是一句“低级错误”就能说得过去的。

此外，公众之所以质疑这一回应，还因为湖北经济学院在研究生考试方面有前科。2016年，该校考研拟录取名单公示后不久，名单中突然增加

了6名未出现在复试名单中的人，其中4人未达复试分数线。被媒体曝光后，学校取消了6人的录取资格。

到底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操作”，需要有全面、详实的调查。当下，最重要的是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纪委进行全面、详实的调查，给考生和社会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而不是任由涉事高校自说自话。不管是从该校有过前科的角度来说，还是这次“改分”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该校都难以作为一个适格的调查主体，其调查结论，不能让公众心服口服。

今年年初，华南理工大学被网友反映存在违规更改2018年研究生复试分数问题。事后，广东省纪委监委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该院4位院领导确存

在更改考生复试分数，影响录取结果的行为。对此，华南理工大学采取了多项处分，并对录取受影响考生依规定程序进行纠正。这样的调查，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形成有效的震慑，让不管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操作”都远离考场。

近年来，研究生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都在增加，2019年全国硕士生研究生报名人数强势增长，达到290万人，创下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录取人数也在增加，但是研究生考试仍然高达75%的淘汰率。相比全国统一高考，高校在研究生考试和录取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权，也因此存在不少漏洞，侵蚀研究生考的公平公正，损害考生的切身利益。对此，必须加强监督与制约，维护好研究生考试的严肃性，切实维护好考生的权益，不能让考生频频为高校的管理失误甚至是背后的暗箱操作买单。

儿童保护话题别总说说就完

□莫洁

据媒体报道，日前，浙江杭州童模被母亲踢踹一事有了新的进展。作为对社会关注和公众呼吁的回应，浙江出台了《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童模活动中，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连续活动超过4小时等。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意见》对童模活动的范围、从业人员及童模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都进行了规范。拉紧的儿童权益保护线，希望能为这场舆论风暴中的孩子们送去健康和平安。

但也要看到，此次意见出台，系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会同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杭州市滨江区委员会所为，上述《意见》的规范作用和影响也仅限于此辖区，对其他地区鞭长莫及。而且，众所周知，童模其实是作为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而存在

的，对非全链条的规范和治理结果，难言乐观。

童模群体的“壮大”背后，是童装行业的蓬勃发展和激烈的竞争。在童模“带货”效应显著的情况下，弃用童模几无可能，照顾孩子的感受和权益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童模风波后，线上狂骂，线下一笑而过的“奇特景观”，早已将行业内部缺乏自我改善动力的事实暴露无遗。“自律”不过寄望过高，“他律”的重要性也因此更加凸显。

童模的保护机制，不应该只存在于一地一区，唯有多地作为不同的节点都不断延长保护的触角，点线相连的网络才能真正兜住儿童的权益。在一些综艺节目中，将儿童“小大人”的话语当卖点，为了节目效果让孩子大跳性感舞蹈，一味迎合成人的口味，流量数字是好看了，但又有多少人关心这些孩子的得失。4月30日，《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宣扬童星效应、炒作明星子女、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做广告代言等亮出“黄牌”，

这对净化内容市场、涵养儿童保护意识将大有裨益。

早在20世纪，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就发出警世之言，电视时代将让童年过早消逝，现代传媒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秘密，让童年的纯真状态丧失了，模糊了童年和成人之间的界限。现实是，撇开技术和时代发展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少人甚至刻意踏平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边界，将纯真和无邪当作商品，让本该无忧无虑自由成长的儿童，过早背负成人世界的名利，过早深谙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这些被扭曲为“伪成人”的儿童，在长大后会不会像史铁生所说的，因“不能怀念自己童年的痴拙”而心生“莫大的缺憾”？但奥地利的作家茨威格在《断头王后》一书中对玛丽皇后的评价值得我们多琢磨几次——“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们不能一边吐槽儿童的“早熟”和“成人化”，一边对因偶然因素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儿童保护话题说说就完。